

RENWU

我所了解的宋庆龄

爱泼斯坦

我的青年时代

范长江

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田 森

我的自学经过

王治林

我的舞台生涯(上)

赵燕侠

访台湾籍知名人士陈逸松先生

曾祥平

农民气象员张启才

郝建生

· 3 ·

人

物

1980



宋庆龄(中)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香港西摩道二十一号总部门前合影。从右至左：廖承志、诺曼·弗朗斯(司库)、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英文秘书)、廖梦醒(中文秘书)、邓文钊(会计)、爱泼斯坦(宣传)。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同志
由陶铸同志（左一）陪同，在广东视察橡胶园。

我所了解的宋庆龄

爱泼斯坦 4

怀念集

少奇同志教我怎样工作和学习

田 流 19

怀少奇同志

刘瑞龙 24

悼田家英（诗四首）

严 秀 44

忆沈振黄

孙 源 156

我的老师吴定良

公 盾 182

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田 森 115

青年时代

我的自学经过

王治林 25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艾 青 62

我的青年时代

范长江 94

关于“反共老手问题”

——答若干同志问

范长江 107

人 物

访问记

从宜兰到北京

——访台湾籍知名人士陈逸松先生

曾祥平 34

蔡元培先生

高平叔 146

爱国华侨司徒美堂

陈 民 159

农民气象员张启才

郝建生 79

杂谈·随笔

读朱自清先生的一组怀旧诗所想起的

叶至善 70

王充驳“增”——兼说“谏”

栗 正 58

知音在，弦断有人续

行 广 170

介绍爱因斯坦的几个侧面

苗作斌 166

“书法不隐”

果鸿孝 137

我的舞台生涯(上)

赵燕侠 46

书信·日记

刘伯坚烈士家书

91

刘伯坚烈士和他的家书

王凌云 92

王若飞的《圣夏门勤工日记》

袁钟秀 129

一九八〇年第三辑

- | | |
|-------------|---------|
| 陈然与《挺进报》(续) | 蒋一苇 174 |
| 林觉民和他的《与妻书》 | 袁定中 144 |
| 王炎华谈她的外祖母秋瑾 | 胡安权 68 |
-

- | | | |
|----|---------|---------|
| 轶闻 | 陈叔通与梅花画 | 唐忠朴 139 |
| 轶事 | 亚历山大轶事 | 胡 椒 132 |
-

- | | |
|-------------|---------|
|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 陈 江 133 |
| 执法如山的洛阳令董宣 | 凌解放 186 |
| 我国医学的先驱——扁鹊 | 安迪光 188 |
-

- | | |
|-----|---|
| 滴水集 | 勇敢地“写”和“扔”(33) 让人永远把你当朋友(69)
秦兆阳豪情似旧(136) 童第周在解放前两件最高兴的
事(158) 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领袖(173) 我
国动画片创始人——万氏兄弟(185) |
|-----|---|
-

封面设计：钟 鸣

我不了解的宋庆龄

——主要是对她在领导战时保卫中国同盟期间的一些印象

爱泼斯坦

实际上，我象世界上一切同我年纪差不多而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一样，早在童年时代就听人说起过宋庆龄了——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和亲密助手；孙中山逝世以后，她又在艰巨的斗争中捍卫着他所遗留下来的革命财富。当时，她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坚毅、正直而又卓有才能的象征，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她跟随着中国革命一同前进，从一个历史性阶段迈进到另一个历史性阶段。

这样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的生活经历是那么漫长、那么丰富多采，以致除了她本人而外，谁也不可能把它深入地、充分地刻画出来。只有一个代替的办法，那就是：由许多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的关系中了解她的人来通力合作，把各自所知道的都写出来。这样，才有可能把她的各个方面展示无遗。现在我就说一说我所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片段，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些印象和接触。先谈一点间接的，然后再谈一些比较直接的，以及在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一些工作情况。

* * *

我第一次看到宋庆龄的形象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只有十岁，在天津上小学。报纸上登了一张她和孙中山一同到达天津的照片。他们当时从广州北上的目的，在于寻求统一中国的道路，而这也就是孙中山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一生中的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孙中山与世长辞，并安葬于北京。广大群众对孙中山的逝世，怀着崇敬的心情，表示了深切的哀悼。我不但在照片上看到了这些情景，而且还听到了一些亲眼看到过这个场面的人的讲述。

从父母亲和长辈们的谈话中，以及从他们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的回答中，我逐渐领会到从照相机的镜头所显示出来的宋庆龄的魅力，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结合。这种魅力是通过她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她在一九二五年向国际上宣告了孙中山著名的遗嘱。两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她对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弃孙中山遗教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她的讲话是那么勇敢、那么令人难以忘却。她还对蒋、汪大规模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痛加斥责，并满怀信心地宣称，中国人民浴血以求的革命不仅会再次兴起，而且必然会赢得胜利。在那些黑暗的年月和危险的日子里，她的社会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她同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革命者站在一起。这就有助于从根本上在全世界公正舆论面前撕去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事业的种种假象。尽管这些叛徒们为了要表白对孙中山的虔诚，每天早上都要念念有词地背诵他的遗嘱，每次发表演讲时都要引用他的语录，在每个办公室的墙壁上以及在钞票和邮票上常常都要挂上和印上他的肖像，但是，他们那个已被宋庆龄撕破了的伪装是绝对骗不了人的。即使我还在少年时代，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而这对于那些年长一些的、目光敏锐、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其所产生的作用就更大了。

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我阅览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间的一些生动的关于革命的报

导。这些报导都是记者和报社的通讯员在十多年以前写的。其中有美国的文森特·谢安(Vincent Sheean)所撰写的《个人经历》(Personal History)。这本著作对宋庆龄和她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通过她所发表的言论才开始认识她的。当我在天津的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收到一些签有她的名字的声明和呼吁书。这些材料经常是装在没有注明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或者是些字迹不清晰的复写副本。有些是她独自一人发表的，有些则和别人一起联名发表。有些声明或呼吁非常激动人心。我后来就是从这些声明和呼吁当中了解到她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不仅说理雄辩，感情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切中问题要害。我记得，有一个声明是她斥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的罪行的。杨是她的一位在中国争取人权同盟工作的同事。另一个声明是，她在一九三四年世界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半公开性的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第三个声明是，她呼吁中国人民进行一场国民革命战争。一九三六年，国民党的苏州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对积极参加救国运动的“七君子”进行审讯。就在这时，传来了宋庆龄勇敢出庭的消息。我在北京期间，她所写的文章，有些是交由埃德加·斯诺转给我的，有些则是由斯诺通知我，要我注意的。斯诺对宋庆龄很尊敬，他利用了一切机会来宣传她的观点。

*

*

*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头两年，我担任美国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在南京沦陷，武汉和广州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我到达了广州这个城市。就在这里，并且在下述情况下，我才第一次会见了宋庆龄。

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大吹牛皮，嘴里说要“打到底”，而实际上却在准备逃之夭夭（没隔多久，他们果然一见到敌人就溜之大吉了）。敌机每天都在向这个没有空防的南方首府疯狂肆虐，使

这里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广州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以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募集抗战捐款、准备进行反击的有力行动来回答敌人的狂轰滥炸。就在这样的时刻，宋庆龄来到了广州。她这次的访问，实在是意义深长、振奋人心的。她的精神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融成了一体。我亲眼见到她在浩浩荡荡的向侵略者示威的火炬游行的群众队伍中行进。我也亲眼见到过她怎样热情欢迎由已故的马登·莫罕拉尔·爱德(Atal)大夫所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见到她怎样鼓励这个代表团到延安去进行参观访问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有柯棣华(Kotnis)大夫和巴苏(Basu)大夫。柯棣华、巴苏后来参加了在敌后进行战斗的八路军的医疗服务工作。柯棣华在战斗中积劳成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巴苏直到今天，还在为印中友好积极工作。

宋庆龄在广州期间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保卫中国同盟，是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成立的一个为了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接触的机构，其总部设在香港。这个机构的人员包括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它有两个目的，而这两个目的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是，要在国外和华侨当中宣传抗日运动，尤其要着重宣传真正的抗日先锋的作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宋庆龄从《中国呼声》这个进步刊物（这个刊物在上海时，曾受到她的鼓励，我也曾给它写过稿）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后，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包括那些友好的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教师，一同发起这个广州分会。从此就开始了我和她之间四十年来的联系，也开始了我和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它的后继组织之间四十年来的联系。现在的中国福利会就是“保盟”的一个后继组织。宋庆龄就是这个组织的主席。我今天就是在这个组织所属的一个对外宣传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

一九三八年年底，广州沦陷后，我退出了合众社，赴香港参



宋庆龄一九六四年会见埃德加·斯诺（右一）。其他人是廖承志（左一）、爱泼斯坦（左四）和他的夫人邱茉莉（左二）。她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积极成员，现在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专家）。

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的活动。此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那里工作。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总部的活动有两个主要特点，这两个特点都是和时代的需要、和她本人的精神协调一致的。一个特点是，坚持原则；另一个特点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的宗旨历来就讲得很明确。它并不是搞慈善救济的机关，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服务的。它反对外国团体把在中国土地上分发援助物资当做“布施”，或者把它作为政治上的恩赐和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同样，它还大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垄断同外国朋友以及救济团体的接触，因为国民党政府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也不为中国人民服务。国民党政府所干的只是对他们实行压迫，使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它对侵略者消极抵抗，但却对人民的抗日斗争进行破坏，而与此同时，还要撒谎造谣，把光

荣归于自己；它不公平合理地分配基金，而对进步人士却横加歧视。它对到手的救济金，经常不拿出来进行分配，而是干脆贪污盗窃，中饱自肥。因此，保卫中国同盟以可靠的分配员锐身自任，凡是送经“保盟”的援助物资，“保盟”一概保证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进行分配，无论如何，要使这些物资有助于中国的抗日斗争。“保盟”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

宋庆龄在领导保卫中国同盟期间，从来都没有对中外反动势力作过丝毫退让。这些反动势力不是企图搞垮和削弱“保盟”，就是假装公开而又热情地表示拥护和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保盟”曾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其所在的根据地建立或扩大了一个又一个的国际和平医院，并在根据地办起了各项福利事业，诸如战时孤儿院和托儿所等。托儿所主要收托那些父母都上了前线的孩子们。“保盟”还帮助过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大学的任务是培训抗日干部。“保盟”也帮助过鲁艺——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是培训文艺干部的地方。这一切，“保盟”都在向全世界进行宣传介绍，并说明这些为什么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对阻止法西斯在其他地方进行侵略的事业都很重要。

不仅如此，“保盟”还打开了通向更加直接的国际团结合作——同其他国家有关组织并肩战斗——的渠道。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几乎就在它成立之初，它就帮助了印度的援华医疗队去延安参观访问。随后对诺尔曼·白求恩前往解放区，它又帮助进行了安排，从那以后，白求恩的名字便和国际和平医院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大夫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就是“保盟”当时派驻延安的通讯记者，他同时又肩负着同白求恩在战地上进行联系的任务。乔治·海德姆在八路军中参加医疗工作的时间更早一些，那还是在红军时期，也是在宋庆龄的鼓励 and 帮助下参加的。直到今天，他还在中国努力不懈地工作。

一九三九年，“保盟”派出了一个给八路军运送援助物资的大

型车队。随同车队前往的有新西兰作家杰姆·贝特兰和年轻的德国大夫汉斯·缪勒。杰姆·贝特兰当时在“保盟”工作，他对抗日战线上的真实情况，曾撰写过许多文章来进行宣传报导。汉斯·缪勒跟随车队到达解放区后就留在那里参加了战地的医疗服务，而且在那里干了好几年。他今天还在北京积极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另外还有一大批药品是由英国的公谊会救护车队派出的卡车运送的，但被国民党所阻拦，未能到达目的地。本来还想派出一批来自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反法西斯的志愿医务人员去延安，这些人都象白求恩那样，过去曾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服过务。但这个计划也为国民党所阻挠而未获实现。尽管这些努力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同国民党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周旋，却有助于使外界了解中国的进步力量和顽固势力之间的斗争情况，有助于揭露国民党的封锁，并在政治上使它声名狼藉、信誉扫地。

就在这个时期，“保盟”为新四军募集了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基金。新四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沈其震同志曾秘密去上海和香港洽购药物器材和安排运输事宜。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在皖南向新四军发起进攻。“保盟”便通过了它用英语和中文出版的新闻通讯以及其他宣传手段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个事变的真相。这对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的行为，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不仅在坚持原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她在领导“保盟”期间所做的统战工作，也同样非常出色。由于她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有着特殊的威望，这就使得顽固派难于向她直接发起攻击，但含沙射影、暗里向她进行攻击还是不少的。同时，各界人士又都以能同她结识为荣。这些情况都有利于推动统战工作的发展。这些因素，宋庆龄都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的。她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一切有利于抗日斗争的事业。

“保盟”在统战工作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避免了宗派主义。它

不仅把援助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帮助那里的各项事业，而且对解放区以外的那些有助于民族抗战事业的单位，也都一视同仁，予以帮助。比如，对中国工业合作社、对救护伤员的中国红十字医院等，都是这样的。而国民党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对那些没有完全受它控制的单位、团体，一概加以歧视。“保盟”除了不搞宗派主义而外，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它还尽可能地去争取广泛的支持者。在香港，它的支持者包括中外人士，其中有的是政界人物和官员，有的是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香港总督曾为它主办过一个筹募基金的运动；英国的大工业家约翰·桑勒克诺弗特曾捐赠了一辆特制的上面装备有一个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挪威的船主埃利克·摩勒以及其他人士所捐赠的款项，为数也很可观。

但是，话得说回来，最大限度地去争取援助，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坚持原则。举个例子来说吧，宋庆龄在战时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和比较顺利的那些日子里，曾争取了他的弟弟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担任“保盟”的名誉主席。但是，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子文就回过头来攻击“保盟”所采取的鲜明立场。他公开宣布辞去“保盟”名誉主席的职务，还对“保盟”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攻击。面对这个情况，宋庆龄毫不退让。另一个例子是，当“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正在加紧策划的时候，英国驻中国的大使企图向宋庆龄施加压力，让她对蒋介石所采取的暧昧策略不要多加批评。宋庆龄不但拒绝了这位外交官的无理要求，而且给了他以尖锐的原则性的回击。她和“保盟”尽管碰到过这样一些矛盾，但是，对统战工作，她并没有因此就变得缩手缩脚起来，而是仍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非常成功地进一步扩大了统战工作的基础。

有些人愿意和“保盟”进行合作，但他们却想回避基本的问题，而只着眼于“施舍”。宋庆龄在遇到这种比较缓和一些的矛盾时，也知道应该怎样提出主要的论点的。她虽然不使用上述那种尖锐

的措词，但她所采取的立场却是坚定的。有一次，当英国已和法西斯德国开战，但还没有同日本交手的时候，香港总督在一篇表示支持“保盟”所发起的一个募捐运动的声明中这样写道：“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难者们以及这些无助的人的要求，都是值得大家支持的，这就是这个运动的目的。”但是，宋庆龄却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进行呼吁。她指出，人民不仅是受难者，而且是战士。她吁请人们给予他们援助时，不要出于怜悯的心理，而要从团结他们的思想出发。团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反对侵略的斗争。她写道：“这个月在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不顾敌人轰炸的威胁却在为中国的医药救济经费而展开一个大的……募捐运动。这个星期，在菲律宾，也正在举行一个同样的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正如我们在香港的一样，用募集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并帮助中国的斗争……”

“保盟”的统战工作之所以能不断巩固、不断发展，不只是由于宋庆龄的威望，而且还由于她的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个立场使“保盟”本身得到了加强。同时，还由于她很善于交朋友。她对朋友十分关心、十分热情，因此，她所结交的朋友，即使经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是始终不渝的。举例来说，凡是同她有过通讯联系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多忙，如果不是在收到来函的当天回信，至迟也要在第二天作复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她一和谁交了朋友，她就要同他永远保持友谊的。当然，有的人，则要另当别论，这就是那些蜕化变质，立脚点完全转移到了敌对立场上去的人，或者是那些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企图滥用同她的友谊关系来为一己的私利，来为卑鄙可耻的目的服务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那她是要断然唾弃，坚决和他绝交的。

她特别鄙视虚伪和装腔作势。她不过高地要求在某一特定时期表现某些进步，但步子不大的中间或保守人士，她也并不因此

而小看他们。但她对欺骗行为，却是毫不留情的。四十年代初期，林语堂从美国返国途中经过香港。他宣扬自己回国是要和“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同甘共苦，直到战争结束。他要求会见宋庆龄，宋邀请了我和其他一些人参加了会见。但当宋庆龄建议他用写作支持“保盟”工作时，他没有任何反应。说穿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下次救济物资何时启运。为什么呢？原来他想把在美国买的一辆价值高昂的汽车，作为运输救济物资车队的一部分，逃避关税和其他一些烦人的手续，一路运往重庆。宋庆龄马上问他是否愿意把他那辆汽车装运医药物资。他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慎重的考虑，回答说，不愿意，除非我们能保证他那辆车的新靠垫不被弄脏、弄坏。他显然是错误地把“保盟”看成是国民党的一个“救济”机构了。他以为只要一旦和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建立了适当的联系，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林先生遭到了客气但是坚定的拒绝，不得不悻悻然告辞上路。至今我仍能想见宋庆龄目送他离去的背影时流露出的嘲讽的神色。

但对待诚恳的同事，不拘职位高低，她总是热情而民主，在各方面都平等相待。在西摩道二十一号“保盟”总部召开的周会，总是不拘形式，很随便，开会地方有很多办公桌，而且常常放着成堆的救济物资，有的需要包装，有的需要打开。我们有着不同的国籍、地位和年龄——我自己在一九三八年时才二十三岁，是所有人当中最年轻的。宋庆龄主持会议，她从不作讲演，只是设法让每个人——委员或工作人员都出席并发表意见。一般总是用平稳的语调表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文静的话语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雄辩、清晰和讲求实际。她从不只限于谈看法或作出判断，而是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并提出具体时间。

如果说她正式接待的人，还有那些在“保盟”有什么活动而坐在前排的人是社会“名流”的话，而那些来“保盟”受到欢迎的人则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都是些普通人。我记得不少人是在美国或

其他国家商船上工作的海员。他们送来在驶往香港途中，或在他们家乡口岸的工会大厅里向同事们募集的几十元或几百元。有些人来过多次。他们的船只一靠岸，我们就知道不久他们就要来敲门了。一般来说，他们的捐款专门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常常带走一包包的关于敌后抗战情况的印刷品。

宋庆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或只是为了说说。从一件难忘的小事中，我看到这种感情的直截了当的流露和力量。一次，她让我和她一起在九龙码头迎接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我迟到了（这是我一个很不好的缺点），发现她自己站在码头工人当中，工人们正忙着准备缆绳、手推车以及其他停泊、卸货的设备。“没想到你一个人来了，”我抱歉地说道。“你自己在这一一定感到很不安。”我说完以后，她对我不遵守时间——任何人身上有这种缺点，她都不喜欢——甚至都忘记了表示不满，而是报以微笑，说道：“周围都是工人，怎么能说是自己一个人呢？”虽然她的职务和环境使她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她心向何处却是毫无疑问的。

在同事中间，她热情洋溢，健谈而幽默。一天，我和一位在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青年唐纳德·艾伦在香港共租了一套房间之后，我们请她吃午饭。我们自己准备一切东西，突然发现缺一块桌布，只好用一条干净的床单来代替。她来了，吃着我们临时凑的午餐，生动地谈论着很多事情，夸奖我们安排得不错。随后，她的目光一闪，问道：“这条床单是从你们谁的床上拿下来的？”没有什么事能逃过她的眼睛，但她丝毫没有训人的意思，所以我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尽管她是一位世界知名人士，而我们只是普通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她欢快的情绪使得很多场合显得轻松起来。有一次英国工党著名人士，后来成为以邱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一位部长的斯特拉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来到香港，要求见她。她请克里普斯来家里吃饭，我们“保盟”的一些人也参加了。但万事似乎都已齐备时，